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

陈之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

陈之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唯物主义与俄国史研究/陈之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3954 - 7

I. ①历… II. ①陈… III. ①俄罗斯—历史—文集

IV. ①K51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659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36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自序:我与俄国史研究	陈之骅 (1)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剖析	(21)
《克鲁泡特金传》引言	(39)
克鲁泡特金与苏维埃政权	(58)
19 世纪中叶俄国进步舆论对中国时局的反应	(78)
从评价帖木儿谈到加强中亚各国史研究	(89)
重视和加强俄国史研究	
——在全国社科院《加强周边国家史研究》研讨会上的发言	(92)
当前苏联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98)
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105)
苏联红军的建立	(121)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旅俄华工	(137)
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44)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历史地位	(155)
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后苏共几次党内斗争	(167)
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统一战线问题的某些比较分析	(180)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政策调整	(189)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主要问题和历史教训	(204)
苏联解体前夕的历史虚无主义	(228)
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努力	
——“八·一九”事件及其失败原因	(239)
对苏联演变深层次原因的思考	(245)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苏联兴亡的启示	(251)

苏联剧变历史之再考察	(261)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273)
结盟—对抗—战略协作伙伴	
——中俄关系的历史回顾	(277)
恢复中苏学术交流之破冰之旅	
——忆陪同翁独健先生访问苏联	(285)
苏共最高领导人新旧交替情况及其特点	(290)
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重要论述的 体会	(296)
世界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	(304)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苏联史研究述评	(312)
1980—1984 年中国世界史研究述评	(333)
后记	(359)

自序：我与俄国史研究

一

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 1949 年上海解放以后。那年夏天我考入上海市格致中学念高中。入学后，有两本书可以说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一本是胡乔木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胡华同志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同志的书是当时我们课堂上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要教材，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该课程的主要参考书。教这门课的老师很有学问，课讲得非常好，至今仍在我脑海里留着深刻的印象。结合这两本书的学习，我读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通过学习历史，我不仅初步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了进一步理解老师在课堂上讲到的一些问题，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革命与改良等，我便找一些有关的课外读物来读。虽然只是一知半解，但总还是懂了一点过去不懂得的新东西。它们推动我去思索更多的问题。

1952 年高中毕业后，我以华东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 年，党和政府选派我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苏联的历史系有四个主要专业，一是苏联史（即苏联本国史），二是外国史（即除了本国史以外的世界各国史），三是考古学，四是艺术史。我选择的是苏联史。我觉得既然到苏联来学习，就应当学苏联历史。因为本国史必

然是任何国家的强项，可以学习得更为系统、更为专业。苏联史专业的学生到高年级时还要分班，分为十月革命前的一段（苏联近代史）和十月革命后的一段（苏联现代史），我选择的是前一段，着重学习 18、19 世纪俄国思想史。列宁格勒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又是列宁主义的故乡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地。苏联近现代史上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与它紧紧相连，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座大型的历史博物馆。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进入大学以后，我的视野扩大了，接触的人和书也更多了。历史是一门政治性和思想理论性都很强、很鲜明的学科。当时苏联的史学理论、史学教学和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尽管有某些教条主义和西欧中心论等方面的缺陷，但主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按照列宁的说法，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唯物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依次更迭，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学习专业课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我初步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学毕业以后，国家分配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做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直接创办的一所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大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是它的特色和强项。在这座马克思主义的熔炉中，我在思想上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提高。到校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编写《第二国际史》教材；第一次登上讲台是为本科三年级学生讲授《第一国际史》。这对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的不到 30 岁的年轻教员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挑战。我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讲解历史。我收集并研究了不少资料，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及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局势的背景材料。我的讲稿，与其说是讲稿，不如说是读书笔记。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认识了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对立。我同时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的诞生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结合俄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结果。

二

1978年，我奉命调到刚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组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我虽已步入中年，但仍像年轻人一样似乎有使不完的劲，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搞学术的时间补回来。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主攻苏联近代史，发表过一些有关19世纪俄国思想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彼得·拉夫罗夫等人的文章和小册子。70年代末，我对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彼得·克鲁泡特金产生了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他的专著。克鲁泡特金虽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像法国的蒲鲁东那样鼓吹用改良的办法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克鲁泡特金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十分推崇法国大革命。另外，他还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发表过大量著作，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他的思想在中国进步知识界，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克鲁泡特金长期以来在苏联是禁区，没有人去研究。他的著作在苏联不能出版，即使在国外出的版本，在苏联也找不到。20世纪70—80年代之交，我们学术界强调要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课题。

克鲁泡特金所有的重要著作几乎都有中文版，都是20世纪20年代巴金等人翻译的。有的书甚至俄文版都没有，因为当初发表的时候他是用外文写的。另外，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有巴金老人捐献出来的克鲁泡特金在法国出版的许多刊物，如《反抗者》报等。在我国20年代的许多杂志上也有大量关于他的介绍。我把全部有关材料，包括能找到的俄文材料以及一些英文材料都看了。至于他写的各种专著、论文和自传，可以说都读

了个遍。

我在研究过程中曾拿着我所名誉所长陈翰笙先生的介绍信，专程去上海请教巴金老人。他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说是为了打破学术禁区，全面地、历史地评价这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生。一开始，他并不赞成我写书。他说：写书没有用，书只能反映你的观点，别人不一定会支持你；最好的方法是把克鲁泡特金所有著作用中文一本一本地公开出版，让人们直接接触他的思想，自己去思考。不过后来老人还是同意我写了。我回到北京不久就收到老人寄来的一些他珍藏了几十年的原始资料，并亲笔写了如下几个字：“用毕请归还，但不急。”

1986年，我的28万字的《克鲁泡特金传》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书中系统地评述了克鲁泡特金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独树一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渊博的科学知识，他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和高尚的道德品性，以及他的两次中国之行，还介绍了列宁对克鲁泡特金及其著作的评价和他们的两次会见。书中对克鲁泡特金在无政府主义理论、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生物学、伦理学和地理学等众多领域内的主要著作，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剖析，并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and 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情况。

三

尽管我对19世纪俄国思想史情有独钟，但世界史所的领导还是希望我能把研究的重点转到苏联现代史（即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史）上来。我没有理由拒绝，何况这也不能算是改行。

当时我国思想理论界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全国学术研究的指导方针。这股强劲的东风自然也吹拂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科院世界史所。根据这种精神，为了使新时期的苏联史研究走上轨道，首先必须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苏联和苏联史的看法切实拨乱反正，认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为指导，这是当时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1983年3月,世界历史所成立了社会主义史研究室(后更名为苏联东欧史研究室)。我被任命为首任室主任。我们联合几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同行,组成课题组。所领导让我担任课题组的主持人。课题组先后承担了两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一是关于苏联过渡时期(1917—1937)的历史,二是关于赫鲁晓夫时期的历史。它们的最终成果《苏联史纲(1917—1937)》^①、《苏联史纲(1953—1964)》^②于1991年和1996年先后出版。这是我国较早的两部苏联断代史专著,问世后颇受学术界的注目。一些高校还将它们列为教材。

我调到世界史研究所后即参与创办《世界历史》杂志。它于1978年创刊,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不久我担任了编辑部主任,后来又担任主编十余年(1983—1995)。在该刊1979年第5期上发表了 my 具有社论性质的论文《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明确提出世界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研究方法,以及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作为主编,充分利用了《世界历史》这一平台,在版面上(包括通过组织一些有关热点问题的讨论会或笔谈等)尽可能地 向苏联史倾斜,以推动苏联史的研究,发现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1985年,成立了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我当选为首任会长。后来我又连任了两届,总共15年(1985—2000)。研究会是我国苏联史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平台。它通过每年举行全国性的学术年会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了苏联史研究的发展。研究会组织会员集体编撰了《苏联历史词典》^③,全书约80万字,共1600多个条目释文,从9世纪基辅罗斯时期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虽是一本工具书,但对苏联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直到现在,它还是许多学仁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①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③ 陈之骅主编:《苏联历史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四

1986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博士生导师。据我所知，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苏联现代史方向的博士点。当年，我就招收了两名博士研究生。他们是1989年通过答辩的郑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0年通过答辩的吴恩远（现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后来又陆续招收了四名。那几年，研究生院给我所的博士生招生名额很少，因而没有可能多招。即便这样，我培养的博士生在当时所里来说还是算多的。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比较严的，首先要求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和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论文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同时要求他们在研究问题和写作论文过程中尽可能多地阅读有关资料。只有在阅读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动笔，在写作时必须理论创新处切实下功夫。但我同时也对他们强调，创新是不能随便贴贴标签的，必须言之有据，而且要符合逻辑，至少要能做到自圆其说。不能为求得轰动效应而哗众取宠，也不能把外国人的某个观点照搬过来算作自己的“创新”。还要特别注意尊重前人的劳动成果，在运用他们的材料时要明确注明出处，是转引的也要注明转引自谁人的著作，不能把别人所引的、自己根本不曾读过的资料作为自己所引的资料。至于抄袭和随意剽窃他人的成果，更是为人所不齿。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们都很努力，不仅很好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在后来的工作中表现得都很优秀，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的另外几名博士研究生是：张建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兴，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春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玉彪，现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工作）。

五

大概是在 90 年代中期，我受我院“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前身）领导的委托，写一篇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和教训的内部研究报告。这篇大约 2 万字的报告写成后发表在《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动态》上。我在报告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 18 年（1964—1982）之久，是苏联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历史进程比较复杂，而且具有矛盾性，不能以一个简单的“停滞时期”来概括，而是要在多层次、多角度和分阶段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大体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由稳定转化为停滞的时期，又是一个在发展中孕育着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形势已经迫不及待的情况下，未能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从而对以后的苏联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并不等于当时的苏联已处于无可挽回地注定要失败的境地。从 80 年代初期的形势来看，苏联 60 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家实力尚未耗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连年下降，但还没有停止增长；上层建筑，包括党、政、军各级权力机构并没有完全失控；各少数民族与俄罗斯主体民族之间那种与离心力长期并存的凝聚力尚未消失；全国大多数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也还没有泯灭。这些情况都表明，如果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制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路线并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话，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完全能够重新振兴的。

这篇报告发表以后受到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好评。因此，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领导要我组织一个专项研究课题组，写一部专著，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科技、军事、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最后由我修改定稿。这就是由我主编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①。我的上述报告成了这本书的总论。

^①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我后来在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苏联兴亡史纲》^①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书中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一章是我撰写的。我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材料说明：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在其执政前期，由于进行了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对其前任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胡改乱革（包括全盘否定斯大林、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农业党”、宣布“20年后建成共产主义”和所谓“三和”“两全”理论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全国的形势是比较好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能灵活使用争夺与缓和两手，并能注意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警惕和防范。在另一方面，我也通过具体材料指出了这一时期的问题，包括中止经济改革，教条主义，领导干部老化和终身制，大国沙文主义，党内外缺乏民主、与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等等，特别是在后期显得更为突出。正是这些问题为后来苏联演变埋下了伏笔。

六

1982年4月初，所长出人意外地给了我一个出国访问的任务：陪同我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德高望重的翁独健教授到苏联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两国的学术交流早已停止。我们能不能应邀前去，院里一开始是犹豫的。最后是主管外事的宦乡副院长拍板同意。后来我们知道，宦乡同志的决定显然是有道理的：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发出了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信号。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在两国关系冻结了近20年后作出的一个可说是最友好的讲话。另外，这项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中亚文化协会主持的（翁先生是该协会的执行局成员），尽管苏联是东道主，但不是中苏两国的双边活动。宦乡同志要求我们利用这次机会与苏联学者进行接触，重建友谊，同时了解一些他们对恢复两国学术交流，进而逐步实现国家

^①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关系正常化的态度。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们与苏联学者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友好接触。这是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后，中国学者第一次访问苏联，因而颇受境外媒体的关注和种种猜测。香港报纸以“翁独健访苏”的醒目标题发表了相关消息便是一例。不过这次“首航”一直鲜为人知，我国有关中苏关系史的著述中对此均未提及。为此，我特意利用我当时所写的日记和信件，并查阅了我院国际合作局的有关档案，写了一篇题为《破冰之旅》的回忆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①文章不仅受到了有关学者的好评，还引起了我国外交部研究人员的关注。

1982年的这次“破冰之旅”，成了我后来一系列出国学术活动的开始。1985年和1990年，我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先后去德国斯图加特和西班牙马德里，参加第16届和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大会由国际历史学会主办，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第16届大会上，我提交了朱庭光和我合写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②一文。由于当时国际学界关于中国的信息较少，因而本文颇受与会者的关注。我还在大会的俄国十月革命史分组会上作了《中国的苏联史研究情况》的发言^③。我提出的关于对社会革命党的评价应当一分为二的观点引起了争论。与会的苏联学者中有很多是持传统观点的，比较保守。我的观点比他们开放一些。不过他们对我很客气，很友好，因为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家人。会上我被增选为国际历史学会下属的“俄国十月革命史国际委员会”的执行局成员。在第17届大会上，我在俄国十月革命史分组会上作了《评托洛茨基》的发言，其中以解放思想的精神对他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贡献作了正面的评价。

1986年10月，我和我院近代史所刘存宽研究员，应设在日本的联合国大学之邀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中、日、俄、墨西哥四国社会变革比较

① 陈之骅：《破冰之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25日第16版；中国世界史研究网全文转载。

② 朱庭光、陈之骅：《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载《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4—456页。

③ 这个发言摘要（俄文）发表在会后国际历史学会编印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材料》上。